

中国当代小品文丛

徐怀谦 著

此心安处

改革者的背影

从自负到自知

欺人与欺天

谋略催人老

民间的孟子

愿以深心奉尘刹

斯文不可扫地

君子身边小人陪

官蛤蟆，私蛤蟆

触摸青铜魂

愧对朱载堉

站在文学原点

中国长安出版社

1521390

九江学院图书馆



18145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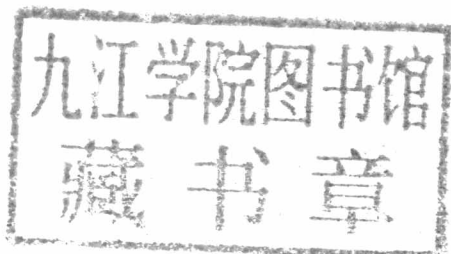
此心安处

中国当代小品文丛

徐怀谦 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I267.3/261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心安处 / 徐怀谦著. —北京: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1.5

(中国当代小品文丛 / 吉霞主编; 8)

ISBN 978-7-5107-0388-1

I. ①此… II. ①徐… III. ①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3507号

此心安处

作 者: 徐怀谦

出 版 人: 黄少平

责任编辑: 张 渊

出 版: 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100006)

电 话: 010-85099935(总编室) 010-85099946/47/48(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网 址: <http://www.ccapress.com>

邮 箱: ccapress@yahoo.com.cn

印 刷: 三河市明华装订厂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8.75

字 数: 132千字

版 本: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7-0388-1

定价: 25.00元

自序

从古至今，靠文学发财的人是很少的。明代的袁枚三十四岁归隐南京随园，整天诗酒唱和，娶过一妻五妾或者更多，狎过妓，还把妓女买来赠送朋友。他能如此风流潇洒，当然需要相当的经济基础。此公确有经济头脑，他依恃自己诗坛盟主的身份，收了不少女弟子，这些女弟子大多是官太太，不差钱，所以袁枚在收取高学费之外，还享受了不少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的好处。他利用撰写《随园诗话》之便，公开收取编辑费，谁掏的银子多，入选的作品就多。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此公在南京和安徽滁州都有地产，他承包给别人耕种，自己坐收渔利。清代的钱谦益不仅收藏了大量图书，还收藏了一代名妓柳如是，靠的不是文学，而是两朝为官赚取的雪花银。当代也有几个作家上了作家富豪榜，有的靠版税，有的靠写字，有的靠触电（电影、电视剧），有的靠办杂志开公司，总之，纯文学收入在其财富中所占的比重是微乎其微的。

文学从业人员更多的情况是“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李白一生豪气十足，“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可是他命途多舛，晚年投靠永王李璘的幕府，寄人篱下，最终穷困潦倒而死。杜甫遭逢“安史之乱”，纵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抱负，却无施展才能之机会，做的都是有职无权的小官，一生颠沛流离，郁郁而终。李清照早年与丈夫赵明诚相敬相爱，生活优裕，后逢金兵南犯，夫妻流落南方，丈夫病死后，她受骗嫁给了昏庸官吏张汝州，频遭家庭暴力，婚姻维持了不到一百天即告结束。但是这段改嫁的经历作为一个污点永远刻在李清照的脑门上，不仅折磨其肉身，更重创其心灵，一代才女最后寂寞地死在江南。

问世人是因穷困而选择了文学还是因文学而导致了穷困？这个问题可以不必回答，但由此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却必须搞清楚：既然文学并不能直接带来财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像飞蛾扑火一样，追逐文学热衷文学乃至献身文学？

答案只有一个：文学可以安妥人的心灵。大千世

界，欲望无限，痛苦无限。财富可以使你锦衣玉食，养尊处优，却无法使你平衡欲望，内心安宁；权力可以使你呼风唤雨，作威作福，却无法使你回归自然，回归人的本性；美色可以供你风流快活，富贵温柔，却也可以消蚀精神，萎靡意志。宗教和哲学倒是可以深入人的心灵层面，让你活得达观、智慧，可惜中国人大多不信教，即使是教徒，也是急功近利，为了祛病禳灾才临时抱佛脚；提起哲学，则大多数人觉得晦涩、头疼。文学，只有文学，从《诗经》发源的中国文学，绵延几千年，流成一条浩浩荡荡的江河，抚慰人的伤口，滋养人的心灵，成为中国人——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生活的营养品、精神的避难所。我很庆幸自己白天从事文学编辑，晚上从事文学创作，是文学的滋养，使我这个农家子弟在进入灯红酒绿的都市之后没有迷失自我，在社会的大染缸里没有同流合污，在浮躁喧嚣的尘世中保持了一份相对的纯净。

“此心安处是吾乡。”我在收入该书的问题散文中这样写道：“无论顺逆，无论穷富，无论贵贱，找到一个让自己心安的支点吧，那是你幸福的根源所在，是安

要你灵魂的精神故乡，是人类亘古以来孜孜以求的一个梦。”是为序。

徐怀谦于北京金台

2010年12月19日

目录

自序

- 001 改革者的背影
- 008 从自负到自知
- 013 欺人与欺天
- 018 生趣盎然
- 024 谋略催人老
- 029 黄帝陵前柏森森
- 034 民间的孟子
- 052 拗相公
- 080 何妨吟啸且徐行
- 127 愿以深心奉尘刹

- 164 风雨中的城墙
- 188 斯文不可扫地
- 192 阴损的招数
- 197 官蛤蟆，私蛤蟆
- 201 皇帝的雅量
- 213 君子身边小人陪
- 216 板柏荡荡比干庙
- 222 芳草萋萋大明宫
- 228 触摸青铜魂
- 234 浮梁县衙怀古
- 239 愧对朱载堉
- 246 感悟富厚堂
- 254 壮哉三宣堂
- 259 站在文学原点

主编手记

改革者的背影

在中国的历史上，改革者的事业是显赫的，但改革者的背影往往是悲凉的。“改革者大多没有好下场”，这是人们从历史中得来的智慧。想想也是，从管仲、子产、商鞅、桑弘羊到王叔文、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结局都不怎么美妙。以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为例，商鞅辅佐秦孝公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但秦孝公一死，商鞅即被秦惠王追杀，并遭车裂之刑；王安石得遇天纵英断的宋神宗，断断续续居相位九年，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南宋时的人说：“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但他从变法之初就一直受到朋党的指责和掣肘，在神宗死后的第二年，新法全废，他自己也忧愤而死，甚至在元人所写的《宋史》中仍摆脱不了刚愎自用、不近人情的诬枉；张居正辅佐幼主明神宗变法十年，使大明帝国从隆庆二三年间（1568—1569）每年收入二百五十万两，支出四百

多万两，财政赤字一百五十万两发展成为有国库存银一千二百五十万两；但死后仅仅九个月，官荫谥号被革除，并遭抄家之祸，长子自杀，三子自杀未遂，全家被饿死者十余口。

“改革者大多没有好下场”，这是一句沉甸甸的话，一句令人心碎的话。难道没有可以“幸免于难”的吗？至少以中国封建王朝史而观，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是由封建王朝的国情所决定的。

首先，变与不变永远是一对矛盾体，没有绝对的不变，只有相对的变化，而改革只是相对变化较为显著者。为什么别的不那么显著的变化不会激起士大夫的反对，而改革却往往引起“民怨沸腾”，更准确说，是士怨沸腾呢？因为天下思定，人心思稳，这是从帝王到庶民都有的一种心理定势。所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与“祖宗之法不可变”相比，前者绝对缺乏群众心理基础。

第二，没有皇帝的支持，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进行。当年奥匈帝国的宰相俾斯麦向李鸿章传授为官之道时说：“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的确，商鞅之与秦孝公、王安石之与宋神宗、张居正之与明神

宗，皆因遇明主或幼主才得以实现其变法的主张。但是他们的主子终究会死或者“觉悟”过来，继任者和“觉悟”的皇帝往往不买改革的账。比如，商鞅变法之初，太子犯法，为树诚信，他的两个师傅成了替罪羊，一个脸上被刺了字，一个被割掉了鼻子，但当太子一朝成了秦惠王，商鞅还有好日子过吗？也就是说，他们改革取得的成功是某个皇帝的专制所赐，而他们的坏下场则是由另一个皇帝的专制造成的。如张居正，不过是从权相的专制还原为皇帝的专制而已，性质是一样的。

第三，所有的改革，不可能不触及官僚阶层和富豪的利益。因为天下的财富不在民则在官，以国富民强为目的的改革，往往是从开源节流两方面入手，要节流，就要裁军、裁汰冗官，甚至是裁减官中的花费；要开源，就要从富豪手中多收税。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必然会得罪巨室，引起所有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这也是阻挠改革的最中坚力量。

第四，张居正说：“治国之要，吏治为先。”要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建立一支行之有效的官僚队伍，要用一批人，要罢黜一批人，而官吏的任免缺乏民

主和法律程序，全由改革者专权或假皇帝之权施行，这就必然会引起党派之争。梁启超说：“宋之朋党，无所谓君子小人，纯是士大夫各争意气以相倾轧。”朋党之祸，纯是内耗，这不仅使改革在当时无法顺利推行，也是使改革遭遇翻盘之厄的组织上的原因。

第五，改革的成效到底如何，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宋神宗评定王安石变法时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便，然于百姓何所不便？”从前的宰相文彦博却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也就是说，士大夫和老百姓对改革的看法往往是不同的，百姓多言其利，而士大夫多言其弊。尤为悖谬的是，老百姓不会记录历史，只有士大夫才会。而当这个问题和朋党之祸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如果后世的史官是反对派一系，那么他们就会对改革极尽诋诬之能事，如《宋史》。这是改革者往往被“妖魔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六，改革者的个人性格是造成其悲剧命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改革者，而有个性在讲究“中庸之道”的国度就会受到非议，比如张居正说：“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

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他以非常之人自况，不就等于说别的大臣都是庸碌之辈吗？另一方面，改革者随着事业的成功，心态上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商鞅，到后来居功自傲到出行都要讲排场，“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张居正从北京回江陵归葬父亲时候，乘坐着三十二抬大轿，轿内饮食起居一应俱全，一路有蓟镇总兵戚继光派来的銃手、箭手随同保护，沿路巡抚和巡按御史出疆迎送，府、州、县官跪着迎接。按规矩，连公侯谒见王爷的时候都要执臣子之礼，可是张居正沿途见襄王、唐王的时候，却坐到了主座上。后期言谈中甚至出现了“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视听翼为，不能独运，不委之于臣而谁委耶？……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自任而谁任耶”之类颐指气使的话。所有这些，必然遗人把柄，一旦改革大业翻盘，就会成为别人进行攻击的有力证据。

上述六种，大致概括了改革者没有好下场的原因，具体到某个人来说，还会有一些偶然的或特殊的原因，但主要的就这几种，而其中最为本质的是第二条，再升华一下就是：上述所有的改革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要巩固、加强君王或皇帝的专制统治，而不是相反。也

就是说，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可以改革，但不能触及专制统治模式。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改革专制统治的觉悟和意识，而只要不改变专制政体，那么改革者的坏下场就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这永远是一个悖论。

谁都知道改革没有好下场，可是为什么在某些历史关头，总会有一些风云人物挺身而出呢？难道他们不知道做个庸官最保险？这就是所谓风云际会。这些改革者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情结，一旦时机来临，没有一个人会因事后可能出现的这样那样的变故而退缩，他们的情怀是：拯生民于水火，舍我其谁？

人们看到，每一次的改革都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果，但改革之后会有反弹，改革的成果会在转眼之间丧失殆尽。所以有人说改革是一场悲剧。我不这么看。我想社会是螺旋式地上升，而改革就是社会上升的阶梯。尽管改革的成果可能被葬送，所有已经发生的改革都未能改变封建社会灭亡的周期率，但改革的历史意义却是不可磨灭的。一次改革没有质的变化，两次改革没有质的变化，但积累久了，就会从中孕育出革命的火种，所

以希冀一下子就能培植或引入一套先进的发达的政治制度是不现实的。这正如煤的形成，是木头埋在地底下，经过很长时间才变成宝藏，最后放出耀眼光辉的，改革的光芒也往往是在很长的时间之后才放出异彩，而我们的历史正是因为这些异彩而流成了一条光明河。

从自负到自知

到江西鄱阳采风，才知道历史上这里曾出过两个赫赫有名的文化人，一个是《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另一个是大词人、音乐家姜夔。

单说洪迈。当地人一提起他，立刻告诉你毛泽东主席几近弥留之际——临终前的十三天，还在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要看这部著作。这部书确实了得，它是作者集40年之功，撰述的一部上自朝廷典章制度、治乱得失、经史诸子百家之言，下至山水风物、诗词文翰、文人逸事，内容广泛、考据精审的读书笔记，共五集，七十卷，一千二百一十五条。第一集出版后，即得到当朝天子宋孝宗的充分肯定，认为该书“煞有好议论”。到了后代，它的名气越来越大。明代河南巡抚、监察御史李瀚评论：“此书可以劝人为善，可以戒人为恶；可使人欣喜，可使人惊愕；可以增广见闻，可以澄清谬误；可以消除怀疑，明确事理；对于世俗教化颇有裨益！”并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推为南宋笔记小说之